

龚鹏程文学漫步

中国小说史论

龚鹏程 著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07.409/18

2008

套册
程
著

中国小说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史论 / 龚鹏程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6

(龚鹏程文学漫步)

ISBN 978-7-301-13559-4

I. 中… II. 龚… III. 小说史—研究—中国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3860号

书 名: 中国小说史论

著作责任者: 龚鹏程 著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559-4/I·203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3印张 385千字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总序

承北大出版社朋友的好意，将我论文学的一些稿件集编起来，分为中国诗歌史论、中国小说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四部，以便大陆的学侶检索参考。感谢之余，谊略附识语，敬述因缘。

我生于台北。少年时期从父教，读了点诗文；又得师友爱护，渐识治学门径。17岁负笈于淡江大学，开始撰写研究论著以自励。大一时试作《庄子注》一帙，大二试作《谢宣城诗研究》，大三作《古学微论》，大四作《近代诗学与诗派》，各30余万言，另有散稿若干。今收在本编《中国诗歌史论》中谈晚清的一些篇章，大抵即昔年残稿，辑出求教于方家的。以后若得暇，将再逐渐整理出来。

那时我正从张眉叔、汪雨鑫、张梦机先生学诗，屡追陪诸诗老之诗酒文宴，文字甘苦，略有体验，故稍不同于一般不能创作的学人。大学毕业，入硕士班后，又秉心得，做了若干推广诗词的赏析工作，撰有《古典诗歌中的季节》、《小品文赏析》、《词赏析》、《东坡诗赏析》、《读诗偶记》等著，销行迄今。因此我的学术生涯，不妨说是由说诗开始的。博士论文做的也是《江西诗社宗派研究》。

但我治学，自幼受孔子启发，子曰：“君子不器”“博学于文”，当然不能只以“兴于诗”为满足。孔子师老聃，而老聃，据庄子形容，乃是“古之博大真人”。我愚妄，遂以博大真人自期，因此文、史、哲、政治、社会、宗教、艺术，什么都要研究。在文学这一块，自然也就不仅限于诗，例如小说，我就谈得不少，后辑稿为《中国小说史论丛》、《红楼梦梦》等。在这方面，我显然又与学界流行的“专家”风气颇不相同。

我们学界，除了强调专业以外，理论研究与实际文学批评也还不一样，人员、思维，乃至学术传统，其实畛域各别。做文学家生平考证、分析作品的朋友，对理论大多心怀疑虑而亦莫测其浅深。从事理论思考的，对作品的实际研究也罕下工夫，纵

其玄思，以构系统而已。然其系统，时或不免于稗贩西方成说。故谈文学创作与作品欣赏者，对之又颇不以为然。我则在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会长期间，大力提倡一种带有文学批评意识的古典文学研究，希望能沟通二者，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乃至文学理论的传统。曾出版过《诗史本色与妙悟》、《文学与美学》、《文学批评的视野》等书。

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的作为，大都具有一种“追求中国性”的意涵。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文学体系，我及我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是想说明：中国文学的特性何在、中国文学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学批评的术语又都有什么确切的含义和指涉。因此，这不是一般地泛述史事、考证史料，或审美欣赏，而是带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方法论思考及中西比较文学视野的探问。例如问：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抒情传统？在抒情传统底下对作品的诠释方法有何局限？中国有没有悲剧与史诗？若无，中国小说戏曲的结构原则又是什么？等等。

不断追问这些问题，当然也就会涉及对文学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梳理，因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如此，必然是与其社会文化相关的，它本身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要面相或内容。因此，80 年代后期我便已开始将文学研究结合起我的哲学、社会、历史、宗教知识，综合发展为文化美学式的探讨，著有《文化文学与美学》、《文化符号学》、《中国文人阶层史论》等书。既由社会文化以观察文学，有文学社会学的趣味；又由文学以论定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说明中国文化因有这么个“主文”的传统，所以迥异于欧西印度诸文明。

释古，目的当然是在论今。我们怎么解释古代，其实正表现着我们如何面对当代。以上所描述的那些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我是谁？我从前是什么样一个人？而现在，由于社会变了，我也不免有些改变。可是我又到底该变成什么样呢？要继续问这些问题，文学研究者才真正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或方向，因此，我虽出身于古典文学阵营，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具体研究课题从来就不限于古典。我曾在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传播管理所、未来所、欧洲所教过书，还办过管理学院，这些与现代社会相关的知识与经验，也显然不同于一般古典文学研究者，会促使我去思考文学再现当代社会大处境与问题。称为“现当代”，当然是从俗，套用大陆流行的文学分类法。我自己对这个名称并不赞成，故有时说现代，有时说当代。论旨自然也与一般现当代文学的名家不甚相同，所辑诸文，可见一斑。



总 序

以上这些叙述，简单介绍了这几本书中各篇文章的总体脉络，否则文章东一篇西一篇，可能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此东鳞西爪者，实非漫然苟作也。这也是它们与一般论文集不同的所在。至于各单篇论文，质疑旧范式，开拓新视角，乃我一贯的风格，便不用说了。

《后汉书》有“独行传”，我亦方今学林之独行者。欣赏我的，视我为独行大侠；讨厌我的，则以为上述种种皆是大盗恶行，不足为训。两方面的评论，我都很喜欢，故略述独行者之独，以为读者告。

戊子清明，序于燕京小西天如来藏



目 录

目 录

总 序·····	1
----------	---

【第一卷 穷方法之蹊】

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	3
小说创作的美学基础·····	16
境界形态的美学·····	29
台湾的明清小说研究（一九八七～一九八九）·····	53
中西情节论·····	63

【第二卷 究天人之际】

神话与幻想的世界：人文创造与自然秩序·····	73
天命思想在中国小说里的运用·····	102
唐传奇的性情与结构·····	123
由哪吒看《封神演义》的天命世界·····	159
看《老残游记》的内在精神·····	176

【第三卷 通文史之邨】

传记小说新思维：纵横于历史、文学、真实、虚构、言说、书写之间·····	189
历史小说的历史与身份·····	199

商战历史演义的社会思想史解析·····	220
导读《三国韬略》·····	235
海洋家族与海洋的身世·····	244
《南宫搏作品集》序·····	247

【第四卷 探古今之变】

改写本《西游记》跋·····	255
黄倬成《施耐庵与水浒》序·····	265
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斋志异》来观察·····	268
《重编笑林广记》序·····	302
鸳鸯蝴蝶派：民初的大众通俗文学·····	316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	334



中 国 小 说 史 论

第一卷 穷方法之賸



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

对中国小说的研究，在目前占着重要地位的方法与方法论中，实证主义仍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是指在小说研究中，以寻找材料、确定版本、考证作者、说明流传沿革、讨论写作年代，兼及其与外部社会的关联等为主要方法与研究旨趣者。这种方法，实际上也就是胡适所开创的那一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路数，远绍清朝儒者诂经治史之术、近揭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波衍不绝，以迄于今。

这套方法，在现在还有市场吗？当然有，而且恐怕仍居主流地位哩！以吾孤陋，所见大陆小说研究界的状况，固然如此；在台湾，似乎也仍是如此。

我曾详细统计 1987—1989 年所有台湾明清小说研究的会议、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出版专著、演讲等等，发现小说研究虽然逐渐蓬勃，摆脱了“小道”的地位，成绩颇为可观，但“有关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发展较不顺畅。因为实证研究蔚为风气，人人讲版本考证。即或分析作品，亦以简单的结构分析为主，很少真正进入理论层次。在面对‘小说’‘中国小说’时，我们该以什么方法来进行理解？看一部中国小说与看一部西洋小说，能不能依同一方法及标准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方法论问题。但很遗憾的是：追问这些问题的人极少。现在一般只用实证方法，有浓厚的历史客观主义倾向”^[1]。

当时我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认为或许与钻研文学理论的一批年轻学者只集中讨论诗论、文论而不太关切小说研究有关。现在想来，原因其实还有许多。例如

“文学研究的传统”，即为一不可忽视的问题。一个研究传统一旦建立，它就不容易轻易被毁弃，它包含着一些理念的东西，如基本预设、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也包含一些操作技术，如论文写作的格式与语言、证明的手段、题目的选定等；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师承、权力、位置、知识系统、社会网络、发表情境、乃至师友情谊之类，错综复杂。要想形成典范的转移，真是谈何容易！胡适等人发展其小说研究方法，至今虽约一甲子，但贤人之泽，五世不斩，流风余沫，不仅尚存，且有新的发展与生机，殊不足怪。

新的发展与生机是什么呢？主要是东西洋汉学研究传统与这个“五四”以来老传统的合流。在澳洲的柳存仁、在夏威夷的马幼垣、在美国的韩南、在法国的陈庆浩、由英返台的王秋桂、自俄罗斯来台的李福清等，都显示了这个倾向，也都对台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为主流，非无故也。

但实证研究基本上只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它大抵均止于运用考据及实证的方法去谈某书的版本、某一作者的生平、某小说的写作年代、某故事的源流演变，而罕能反省其方法本身究竟系基于何种认识论而建立、此一方法的效能与局限又在何处。故通常此类研究者虽应用方法，实不甚思考方法，对方法论的探索反而无大兴趣。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讨较少，就是此种学风发展下很自然出现的状况。

不只如此，这类学者还可能会出现排斥或鄙视理论及方法论的现象。许多人认为，钻研理论只是“务虚”，你讲一套我讲一套，远不如考据实在。而且理论变来变去，某些理论风行一时，但转瞬便遭遗忘，仿佛流行服饰一样，更让人觉得还是老老实实考据，可以作出些扎实可靠的成绩来。

这当然是偏见。站在文学理论研究的立场看，理论的推陈出新，本为应有之义，这不代表理论就是空洞的、虚浮的，而恰好显示了这一门学问的进展。我们能因哲学上流派龇起便因此觉得这门学问太不可靠而不去做吗？觉得理论研究过于玄虚，其实只是迷信考证者的偏见。人生既不可能没有哲学，文学研究中势必也不能没有理论研究。而且任何研究，包括考证，恐怕都要受到理论的影响，考证工作，本身就是某一理论的实践。

现在，我们因惧怕理论的变异而考证，为寻求具体、稳定的学术成果而考证，这样的考证可能也是一种“迷思”。为什么？



第一，我们必须晓得：考证也不是确然稳定的。资料的追寻，永无止境。考证者事前既没有一纸清单，告知你究竟要寻找的资料版本有哪些，搜集到什么地步才能安心地说“够了”，谁也没把握。因此，考证所得，也随时会被新发现的资料推翻。从前，关于《孙子兵法》的真伪，从姚鼐到钱宾四，都认为在理论和物证各方面，铁案如山，乃孙臆所造，非孙武之书。可是临沂银雀山《孙臆兵法》出土，此一铁案便立刻被推翻了。

第二，考证表面上是很客观的，但实际上根据同一资料却可能出现全然不同的论断。迷信考证为客观征实的学者，或许无法同意此说，然而《红楼梦》就是现成的例子。红学家用的材料没什么大差别，可是考出来的结果，几乎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考证跟客观、真实、不可变之间，恐怕不能画上等号。

第三，考证的危险在于，它虽不掉入观念的网套，却会变成材料的奴仆，以追逐材料为满足。材料永远是不能齐备的（请注意历史知识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那我们就不说话了吗？不幸现在业已有些朋友是如此了。

第四，搞考证的朋友，相信没有翔实可靠的资料做基础，很难展开什么研究。而他们努力搜集的各种材料，确实也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令人感动。但是，考证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作为一个恰当的“基础”，而展开文学的研究？例如，考证学家会说“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怎么研究？”或“必须有个完善的本子、确实可知的作者，研究才不会讹误”，却没注意考证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而不只是基础。考证的问题既可无限发展推进，怎么能等考得完备了再来做文学探究？《红楼梦》考到今天，依考证为“基础”的文学研究迄未展开，反倒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大家承认它确有价值。可见，考证与文学的研究不必是必然相关联的。全然不管考证，依旧可以做很好的小说研究。“不考证清楚怎么能讨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简单逻辑，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真相！

第五，小说研究中，考证所能着力的，只有作者、作时、版本、故事源流与传播之类问题。这样，则小说研究基本上仅为一小说史的研究而已；不，这小说史又只是小说编撰史而已。其他问题，殊难处理。此为考证方法的局限。即使突破这种局限，把小说跟民间传说、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现在似乎也不免将小说作为一种史料来运用，视为研究民俗与社会文化的材料，而不是文学的研究。和文学的历史论批评、社会文化论批评，距离实在非常遥远。作品美感性质的阐释、小说之所以为小说者，

居然在小说研究中消失了。

第六,版本与作者问题重要吗?在我看,实在没有那么重要。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小说与士大夫文学不同,不必如研究士大夫文学那样讨论作者问题。其说虽未引起考证学家广泛的注意,实则从小说的传播而言,不同的版本自有不同的阅读功能和读者群。读者接受小说,亦并不以追寻作者创作时的原貌为阅读预期。这是小说跟知识性读物、抒情作品不同处。现在的许多研究者,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传播情境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把小说视为一封闭的、自足的语言世界,斤斤于考辨其中一字一句,期复作者创作或刊印时的面目,这或许有比“追求原意”更大的谬误吧!

第七,考证原作、原本及故事源流,在顾颉刚的运用中,其实含有“历史是层累增饰”的预设。他相信有一个“历史的真相”是客观而稳定不变的,只要揭开后人传说层层增饰的面纱、排除后人“伪造”的成分,即能显现出来。此说本身便是充满科学想象的浪漫历史观。需知所谓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客观稳定而唯一的,也不是一个超然的存在。它不断流动于每个时代的诠释者和叙述者之间,是不断被“改写”与“重组”的人文成就。其中充满了“对话”的过程,舍离了这些诠释与叙述,即无所谓历史的真相。而这些诠释与传述,并不仅仅是“层累”而已,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扩散、断裂、衍异、流失。故基本上,它不是层累地“造成”,反而是解构(deconstruct),饱含分裂、变化、矛盾以及难以掌握的播散。传说的语意内涵,遂因此而随时变衍,永远受制于阅读或传述者的阅读经验,不仅无法产生定点的指涉,“传说”和“阅读”根本就是互为指涉或互补的。我们既不可能掌握并了解传说所有的流传状况,则任何传说或故事的母体或本源,就都是不定的、或不可能的存在。企图以文件资料的堆积,外加堆积者心机上的附会,以建立或溯求传说的原始形态,殊属缘木求鱼^[2]。

再依哈贝马斯所说来看,任何一个解释,质实都是寻求被解释者的“有效声称”(validity claim);但这些有效声称之间,是可以互相批判的。这种批判,并不是说在客观世界中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我们只要看看哪些有效声称“符应”(correspondence)了它就行了。真理不在符应,而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论证形式(如理论的辩论、实践的辩论、心理分析的判断、语言辩论等)来获得^[3]。小说考证的出现,正是为了要替各种有效声称寻求一批判依据。但因它相信有一客观固定的事实,且只能依某一有效声称是否符合该“事实证据”来论断。因此虽耗尽力气,却可能依



然是考而不能证。《红楼梦》的考证即为其中一例^[4]。

凡此等等，考证之道，可批评之处显然不少。此等批评与质疑，小说考证家未必首肯心服，但若仍以正宗自居，夷然不屑于理论之途，不能与质疑者在方法论上交锋，恐怕也非守成之道。

二

相较于这个“五四”以来的小说研究传统，那些“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解析中国小说”的人，一般视为新派。

但这种对比，其实甚为笼统含糊，因为“五四”以降那个小说考证传统，虽有乾嘉朴学的面貌，骨子里仍是西方理论。科学研究的模型、客观性的追求，乃至对于“何谓小说”、小说的审美评价判准如何等等，它们无不深受西方的影响。只不过此一传统建立既久，又有考据的手段，故常被另一些拟运用其他西方理论研究小说者目为旧派罢了，我们若把美国新批评对历史批评的攻击史，移来观察中国小说考证学派遭到的挑战，似乎也无不可。

其次，所谓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解析中国小说者，指涉甚为含混，包涉极广。每位运用西方理论的人，所采择的理论并不相同，所使用的情況也各异其趣，焉为视为一派？

此外，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解析中国小说的朋友，也大抵与从事小说考证者相似，基本上乃是依从着某一理论，以其观点与方法来处理材料（小说），属于方法应用的层次。例如谈艺术技巧者用新批评、分析情节单元与冲突结构者用结构主义、讨论人物性格与意识状态者用心理分析。其写法大约也是先叙述理论的大要，再说明分析的方法，然后举小说人物情节等以坐实之。故常被讥为“套用”。能在套用之余、应用之后，进一步发现某一理论与材料（亦即中国小说的现象）不尽相符，而对理论提出修正意见，或对方法的适用程度展开一些探讨者，已称罕睹。换言之，应用方法者多，能进行方法论思考者仍然甚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不是由于这些研究者虑不及此，而是因为这些研究者有不同的关切。此话怎讲？

在1980年代，台湾学界提出“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命题时，即曾认

为中国化的途径与方法可能包括：

（一）在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如何选择西方学者尚未研究过的问题与方向？

（二）在研究共同性的问题时，如何选择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角度？在共同的研究变项之外，如何选择同类西方研究中所未曾用过的变项？

（三）如何有效进行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research），以验证西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否适用中国社会与中国人？

（四）在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如何修改西方学者所设计的工具与方法？如何自行发明适当的新工具与新方法？

（五）在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如何检讨与修改西方学者所建立的有关理论，而不轻易全盘接受？^[5]

这些呼吁，同样适用在运用西方文论以解析中国小说者身上。但目前这样的做法却较少出现于小说研究中。相反，依目前的情况看，似乎运用西方文论以解析中国小说者的用心，仍重在“趋同”，甚于“别异”。这是较重视西方文论也能有效地使用在中国小说的解析上，较想以其实际解析来说明此一方法运用如何丰富了中国小说的意涵。方法本身，则被视为具普遍性的。例如弗洛伊德、荣格对人的潜意识所做的研究与发现，虽出现于西方，但中国人既也是人，自应可适用其理论。得此理论之“照明”，中国小说中诸多意涵（例如薛仁贵回家看见薛丁山的鞋子之类）乃得以重新被发觉。

小说研究者重视趋同甚于别异，主要原因在于小说内容的研究太过贫乏。早期文人及学术传统不重小说，近代小说考证所做的，大抵又只是新批评所说的“外部研究”，故只要能发掘小说内部结构的奥秘、说明其人物性格的隐曲、剖析作品艺术技巧的奥秘者，论者均乐于使用。修改西方学者所设计的工具与方法、或验证西方研究是否适用于中国小说、选择同类西方研究中未曾使用过的变项等等，相较之下，自然非其措意所在。

何况，知识权力关系，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如此。小说考证仍居主流，它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新知识环境的变动及理论的进展，是无动于衷的。它们仍固执其原子论式的认识心理学、历史主义的知识论、实证主义的方法学。也根本不认为在考证未明之际，高谈阔论其内容有何意义。要对抗这种学界势力，自须强调运用西方理



论来解析中国小说是有效的。自我反省、区别中西小说之异、发现西方理论或许并不适用于中国小说的材料，则可能会变成授人以柄，故彼等不重视这一面，也不难理解。

三

但应用西方文学哲学理论，以其观点及方法来处理中国小说材料，当然会有材料与方法适不适配的问题。割鸡尚且不必牛刀，拿把刀子来，又岂便于炒菜？批评方法若是解析工具，工具或许也具有普遍意义，可是吃中餐毕竟是用筷子较为方便，用刀叉则有时不对味儿、有时也确实不甚利落。这就是批评方法在实际操作运用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并不能漠然视之，完全不谈。

文学理论界对此当然已探讨甚多，从叶维廉反省东西“模子”之不同，而发展其道家美学的论述，到郑树森、周英雄编《结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讨论结构主义能否适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解析，都是足以称道的成绩^[6]。其中对于小说的研究，也有涉及。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大约是：运用各类理论及方法来解析作品，本为应当之事，所以无论什么方法均欢迎使用，且若能在方法意识清楚地自觉之下使用方法，则亦不至于出现生吞活剥、削足适履的现象。

但是，应用西方理论与方法来解析中国小说的正当性，纵使大家已可不太质疑，应用者仍不免会遭到“套用”之讥，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主要是操作手法上出了些问题。首先是写作风格。应用西方理论及方法者，如前文所云，必先叙述其所采据的理论大要，说明其批评方法，然后再举小说人物情节等等实际说解之。此固中规中矩矣，然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不正是“套用”吗？

以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朝传奇中的悲剧意识》为例，此书正文250页，六章。前面三章，105页，全部谈的都是悲剧的问题，从希腊悲剧的起源、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到悲剧的冲突及其元素，几乎是悲剧理论的专论了。论毕之后，才举了三篇唐人传奇（《步飞烟》、《霍小玉传》、《枕中记》），分析其悲剧意识^[7]。一位想了解唐人传奇中爱情与梦幻的读者，看到这里，才晓得他并不能由此明白唐人传奇中的什么爱情与梦幻，只是重新读了一遍悲剧理论，且知道唐人三篇文章中具有悲剧意识而已。请问：他对这样的研究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如果论文不是头巾